**第五部分：湖湘首邑（三国—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到两宋时期，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封建科举制度的确立，长沙书院兴盛，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湘学中心。

**第一单元：风云要地**

长沙地处江南，占有南北贯通、东西交错的重要战略位置。赤壁之战后，吴蜀政权在荆州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两晋南朝时期，长沙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成为当时北方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之一，社会经济在动荡中不断发展。

**第一组：动荡中的艰难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混战、分裂、割据状态，江南地区却相对稳定。西晋政权灭亡后，晋皇室和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渡江南下，民族的融合，人口的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对江南地区的开发，长沙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手工业产品商贸地。

孙权和刘备，中分荆州：湖南境内以湘江为界，长沙、桂阳以东属吴，零陵、武陵以西属蜀。

在六朝时期的一些名人在长沙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三国时期韩玄在长沙任太守，受讨虏将军[黄忠](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688/5045229.htm)管辖。韩玄墓位于今长沙市长郡中学内。

[东晋](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2.htm)名将**陶侃**封爵长沙郡公，驻节长沙期间，致力于安抚难民，恢复生产。陶侃初入长沙时，曾于岳麓山结庵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

湖南最早的佛教圣地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麓山寺，**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山腰，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是中国金银生产和器物制造历史中的低谷,这一时期金银器与两汉相比，数量减少，体积较小。这些金器造型简洁，纹饰精致，对了解湖南古代金银工艺、金银使用历史以及当时人们的起居生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资料。

六朝时期，湘州地区青瓷烧制获得了较大发展，青瓷器品类丰富，数量庞大。先后出现了石门矶窑、岳州窑等名窑，为唐宋时期湖南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湘阴窑，唐代称“[岳州窑](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45006)”。这件**青釉鸡首壶**便是湘阴窑烧制的作品。鸡首造型均为雄鸡，因为雄鸡有辟邪消灾的作用，且“鸡”与“吉”谐音，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期望。

**滑石双猪、陶俑和石俑**等都是古人用于陪葬的“明器”。其中猪象征着财富，人物俑则是奴仆、侍卫等，象征着死后同样也能享受生时的待遇。

这是1977年夏在长沙县南朝墓中出土的“**徐副石买地券**”，为一青石平板镌刻而成，全文493字，是南朝买地券中文字最为完整的一方。买地券是记载土地买卖关系，可起凭信作用。“**徐副石买地券**”说明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制当时在长沙地区有所发展。

**第二组：吴简证史**

1996年长沙市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厦建设区域（原走马楼）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古井57口，在编号为第22号古井中，出土带文字三国吴简76000余枚，主要内容为三国孙吴政权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档案，包括赋税、户籍、司法、往来文书等,涉及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长沙吴简是二十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极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见证了孙吴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长沙郡的管理和经营，对研究孙吴长沙郡、吴国的历史乃至中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是当时一位叫区伯的农民向县乡级官府佃田以及缴纳租税的凭证，叫做《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将一式两份或三份券书剖开的意思。器物两侧均有被剖分的痕迹，它是一式两份的劵书，就如今天的两联单。

**户籍简**记载了民籍、吏籍、兵籍、家庭户籍以及户籍检核制度等资料，使我们对孙吴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司法文书**常为木牍，杉木制作。内容主要记录了孙吴嘉禾时期的户籍审核、民事诉讼、经济审判等案件。

**签牌**即木楬、标签。

**名刺**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名片，其上写有姓名、籍贯、字号等，主要用于拜访时自我介绍。

**第二单元：盛世潭州**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发达、繁荣富强的统一多民族封建集权国家。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和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善，长沙地区社会清明，城市扩展，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商贸、文化中心。

**第一组：潭州风华**

潭州城四至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长沙市北起中山路、南至解放路，西起湘江路、东至蔡锷路，是唐代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潭州（长沙地区）的粮食供应在唐王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全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了唐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基地。

唐代是中国古代瓷器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发展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组瓷器基本上为青釉瓷，胎质细腻，釉色均匀，形制优美。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期，铜镜也迎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大量外来文化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葡萄纹就是吸收自外来文化。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件**瑞兽葡萄纹铜镜**，铜镜饰满葡萄文，内区围绕兽钮环装饰五个瑞兽，姿态各异，在葡萄枝蔓间嬉戏。

**中南工大唐墓**位于中南工业大学桃花岭，是目前湖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代砖室墓。墓主人应为晚唐潭州府高级军政贵族，为夫妻合葬墓。

此墓出土了各类珍贵的文物有50多件，主要以金银器、瓷器、铜器为主。这一组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汉式镜，创造出各种花镜，其中**“****唐星宿八卦纹铜方镜”**是别开生面的方形铜镜。这件铜镜形体大气厚重，饰有八卦纹、福禄寿纹和二十八星宿纹，十分罕见，为研究唐代天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金银器制作的巅峰之一，在世界金银器中也独树一帜。插梳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款妇女发饰，且历史悠久。这对莲花纹金梳的出现让我们能够一窥唐代妇女雍容华贵的风采。这两件金梳呈马蹄形，纹饰基本相同，中间有一朵盛开的莲花，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全国佛教大兴，禅宗在江西、湖南两地得到迅速发展，道林寺、密印寺等一大批佛寺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潭州佛教极盛的见证。

这件**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的经幢整体为模拟古代佛塔的形状。经幢作为一种宗教遗物，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解除众生秽恶道苦，二是为了解救地狱众生。只要经幢的影子或灰尘落在人的身上，经文就可以发挥作用。

**第二组：人文荟萃**

隋唐时期，潭州政治军事地位的加强，一方面大批唐代著名诗人、学者或谪居、或游历潭州，为长沙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诗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潭州籍人才辈出。这一时期，潭州人文荟萃，在诗歌、书法、医学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三次寓居潭州，留下了近百首诗篇。诗人在769年春离开潭州赴衡州时作**《发潭州》**，成为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篇。在长沙湘江东岸建有杜甫江阁以用纪念。

**欧阳询**是潭州临湘人。唐代著名书法家，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其书法度严整，自成一家，被称为“欧体”。

**怀素**是永州零陵人。[唐代](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著名书法家。自幼出家为僧，爱好书法，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李邕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麓山寺碑》**是他的代表作，因文、书、刻工兼美，故称“三绝碑”，也是长沙市尚存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千金要方》，**是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长沙市天心区药王街建有药王庙，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药王。

**第三单元：唐风妙彩**

**长沙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又称“长沙铜官窑”。长沙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烧造彩瓷及釉下多彩瓷为主的窑口，她打破了当时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成就了三足鼎立的中国陶瓷版图。长沙窑器型繁多、色彩丰富、装饰多样、题材广泛，是长沙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窑口。长沙窑在一千年前就已行销半个地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陆口岸，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彩瓷第一窑”。

长沙窑陶瓷原料均就地取材，产品大多以辘轳轮制为主，使用卧式龙窑单件装烧和多件叠烧制而成。这一组器物便是长沙窑的制瓷工具。

（高岭土、各种釉料、匣钵、研轮、研槽、毛笔与竹签、模具、瓷拍）

长沙窑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

唐代长沙窑以龙窑为主，在**长沙窑考古发掘图照**中看到的谭家坡1号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龙窑，由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构成。

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和晚唐诗人李群玉都曾到过长沙窑，并且留下了《铜官渚守风》和《石渚》等著名诗篇。

**第二组：长沙窑瓷器造型**

长沙窑窑区规模宏大，烧制时间持久，产品造型丰富，品类包罗万象，包括碗、壶、罐、枕、茶碾、文房用具、造像等，几乎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组：长沙窑瓷器色釉**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到唐代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局面。长沙窑在“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青釉、酱釉、绿釉、蓝绿釉以及窑变釉等种类丰富的色釉，奠定了唐代瓷器“南青北白长沙彩”的局面，对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组：长沙窑装饰艺术**

长沙窑装饰技法融南北瓷艺之大成，其以多色釉和釉下多彩为基础，广泛借鉴中国书画的笔墨传统，并融入外域文化与图式，植入文化时尚诗歌与警句，形成了以彩绘、题诗为代表的彩装饰和以模印贴花为主的胎装饰，开创了中国彩瓷文化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第一座彩瓷窑。

长沙窑彩釉的装饰技法有釉上彩、釉下彩、釉上与釉下彩相结合等，开辟了中国古代瓷器色彩斑斓的新世界。

长沙窑吸取唐三彩的彩绘工艺和唐代青绿山水画、花鸟画等技法，创造性地将褐、绿、蓝、红等色釉以诗、书、画的形式有机地植入瓷器的装饰工艺中，瓷器成为书画艺术的载体，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工艺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长沙窑绘画装饰中**花鸟画**占比例最大，水平最为突出。

长沙窑**人物画**题材器物非常少见，展柜中这件“竹林七贤”诗词瓷罐堪称长沙窑人物画题材的精品。在瓷罐的腹部彩绘了一幅两人谈玄图，左侧人物表情不羁，两宽袖均向左侧飘逸，为“七贤”中的阮籍。右侧人物为“七贤”中的王戎。二人相对而视，仿佛正在交谈。而在瓷罐的另一边写着一首诗，诗文对仗工整押韵，正切合“竹林七贤”酣酒畅饮的主题。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的七位名士，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诗文右侧有款“七贤第一祖（组）”，由此可见此罐应是一组定制产品中的一件，今日已是仅存之孤品，更显珍贵。

长沙窑山水画一类是受到盛唐时期宫廷工笔青绿山水画的影响，但其画法自然，画面更具情趣和诗意，代表了长沙窑对于唐代宫廷山水画的民间理解。

**长沙窑写意画**以白釉绿彩的形式表现最多，是利用釉色的浸润效果而产生由点、线组成的虚实相生的抽象美感。

**长沙窑宗教题材画**主要包括摩羯、佛塔、贝叶棕榈等，其线条繁复，意境深邃，是长沙窑为开拓海外市场迎合异域文化风情的产物，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宗教文化浸润的真实反映。

**长沙窑诗词书法艺术，**诗歌与书法在唐代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长沙窑创造性地首次将诗歌植入瓷器装饰中，极大地提升了瓷器的观赏、审美、教化价值。目前已发现并释读的瓷铭诗中有8首出自《全唐诗》。长沙窑诗歌与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件唐长沙窑青釉“鸟飞平无近远”瓷盘，以褐色彩书“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四句诗文。这首诗原为唐代诗人刘长卿所写《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这首诗是刘长卿被贬时所作，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全诗景中含情，笔致清婉，结句虽含慰藉，意实深悲，伤感之情，寄于言外。

除诗歌外，长沙窑瓷上还有不少谚语警句，其内容多样寓意深刻，包括人生哲理、忠孝廉洁、耕读科举、勤俭持家等哲语警言，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的确立，为封建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民间商业经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长沙窑浓厚的商业行为和强烈的广告意识在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最多的一类就是作坊名。其中这件青釉褐彩“年家”瓷壶腹部以浓墨重彩书写“年家”二字，可证明此壶为年家作坊所制。在商品上写上作坊主的姓氏，有着对产品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

**长沙窑模印贴花工艺**最具特色，其内容丰富多彩，造型细腻入微，有人物、动物、植物、花鸟等，其中包含有“洋”味十足的西亚文化元素，各具形态的贴花造型将长沙窑瓷器生产装饰更规模化和效率化。

**长沙窑雕塑产品**包罗万象，佛家造像、生活用具、文房用品、儿童玩具等应有尽有，尤其是儿童玩具是别开蹊径，独树一帜。采用捏刻塑雕与模制相结合，大量生产各类动物形象玩具，栩栩如生。

9世纪后期的晚唐时期，因北方持续战乱，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被日益阻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长沙窑在大唐文化容纳万有的景下，创造性地生产适销亚非地区产品，凭借石渚天然的港口，产品行销大江南北，足迹遍布亚、非两洲，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大宗商品

我们可以看到长沙窑瓷器装船出航的场景复原，江面上帆船如[过江之鲫](http://hanyu.baidu.com/zici/s?wd=过江之鲫&from=pcus&srcid=28204&query=形容多的成语)，码头上工人们热火朝天的搬运着即将销往世界各地的长沙窑瓷器，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繁华局面。

2010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万达广场片区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此区域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等重要遗迹，为研究长沙古城的商贸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这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中的码头木，它走过千年时光，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长沙窑的兴衰史。

**第四单元：马楚王国**

唐末，武安军节度使马殷统一湖南，建立封建割据政权楚国（896—951年），都潭州。马楚王国共传六代，历56年，是湖南历史上唯一以长沙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马楚政权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长沙城市得到了极大拓展，为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马楚国都**

马楚政权养士息民，发展农商，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都市。马楚政权后期奢侈骄逸，大兴土木，宫殿、楼台、佛寺等园林建筑蓬勃发展，潭州城得到了极大拓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繁盛的都城之一。

五代十国指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和南方和河东地区的十个封建割据政权。从**五十代国形势图**可以看到马楚王国全盛时，管辖区域共24州，就是今湖南省全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贵州省东部和广东省北部。

**《楚王马殷纪功碑帖》**是1920年拆除长沙浏阳门城墙时出土，碑帖现存湖南省图书馆。马殷统治时期，社会稳定，国库殷实，湖南经济得以发展和繁荣。此碑文颂扬了马殷的历史功绩，是研究马楚王国的珍贵资料。

马楚政权设置溪州刺史，辖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爆发。940年楚王马希范与彭士愁罢兵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今永顺会溪坪酉水河岸。盟约规定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各自所辖地域互不进犯等。溪州结盟化解了民族纷争，开创了湘西溪州八百年土司王朝的统治。

**溪州铜柱**是土家族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二组：商旅四方**

马楚政权利用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使马楚呈现出国富民强的社会局面，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城市。

为了发展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沿用**唐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铸造铅、铁钱币在境内流通。由于铅铁钱币笨重，携带不便，就只能把这些钱币换成湖南本地货物运出去，因此促进了湖南地区的出口贸易，刺激了生产，增强了财力。

马楚国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龟塘”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能溉田万顷。“龟塘”也就是现在的**圭塘**。

茶税为马楚主要税收来源。为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马殷采纳高郁建议，在汴、郢、复等州**设置回图务**（相当于商行），运茶于[中原地区](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5%8E%9F%E5%9C%B0%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WD4uh7-rjTzPvuWrH0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6Ln1b3PWDs)，换取纺织品、战马，获利“岁百万计”。马楚茶马互市的开辟，使长沙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万里茶路的重要起点。

五代时期瓷器的胎釉、[器型](http://zlk.sssc.cn/w/%E5%99%A8%E5%9E%8B)、纹饰等都与唐代风格有着继承和变革的血脉联系。唐到五代，笨拙粗重的造型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精巧优美的新型产品，丰富多样，风格鲜明，具有新的时代的特征，在工艺方面也更为成熟。唐代的雍容浑厚，五代的优美秀致，各具特色，而又都表现着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

**第五单元：潇湘洙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的确立，潭州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潭州政局相对稳定，农业、手工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成为中部地区的商业都会。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书院兴盛，群贤汇集，人文兴发，学术昌盛，成为“湘学中心”，同时，湖湘学派的形成，也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组：湘岭要据**

两宋时期，潭州是湖湘地区政治军事重镇，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两宋统治者加强了对潭州的统治，一大批名吏贤臣治理潭州，潭州社会获得了极大发展，为长沙明清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潭州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四至图**）基本定型，整个城市负山面江，蔚为壮观。潭州城虽在金、元南侵中屡遭战火，仍为“湖湘一大都会”。先后有**李纲、岳飞、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等重臣名将任职潭州，治理湖南，潭州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

**第二组：坊市遗迹**

两宋时期，城市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被取消，形成了开放式街巷的城市格局。考古工作者在坡子街、五一广场以及万达广场、九龙仓等建设工地，发现了宋代长沙城墙、排水实施、房基等遗迹，再现了两宋时期潭州城市的风貌。

这些涵渠、道路、排水管等城市基本设施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智慧，同时水井的大量开凿又方便了生产和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右下角这个冰井，又叫冷藏室，也是较早的自然环保又经济实用的冰箱，所以，宋代人当时就能够在炎炎夏日享受各类清凉解暑的冷饮了。

**第三组：商业都会**

两宋时期，潭州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商业贸易日趋繁荣，潭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都会.两宋潭州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农业方面，宋朝鼓励垦荒，曲辕犁、龙骨车等生产技术的提高，优良稻种占城稻的传入，象牙占等新品种的培育，使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和主要粮食供应基地。

潭州**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制茶业、茶器、丝织、制墨等都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优势，出现了雇佣制手工作坊，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极大加强。

这八副木雕版画，展示的就是诗中所提及的“潇湘八景”，为湖南风景之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称颂。其中江天暮雪描绘的就是橘子洲白雪江天浑然一色的美景。

同时，宋代也是瓷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衡山窑是继长沙窑之后兴起的彩瓷窑，这一组瓷器，都来自于衡山窑，胎体厚重，胎质坚硬。

在中国传统婚嫁礼仪中，新婚“三金”沿袭自宋元时期，**元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就是“三金”当中的一件**，**双面镂空透雕，整体外形与香囊非常相似，两面中心的主体花纹都是双龙戏珠。霞帔金坠是配套古代女性服饰——霞帔上的一种装饰品，垂于霞帔下端。

两宋的**钱币**制度，也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中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造了49种年号钱。

**宋“长命富贵”金钱**是用黄金打制而成，轻薄如纸，中间有方形孔，外缘经过修剪，钱币上有“长命富贵”四字。这个钱币并无面值，专家考证认为是压身钱，放置在墓中为吉利或辟邪的一类物品。

**第四组：湘学中心**

宋代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发展，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书院兴盛，群贤汇集，学术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湖南“湘学中心”和南宋理学基地之一，誉为“潇湘洙泗”。

文化的繁荣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书院的兴起，其中被誉为千年学府、“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位于长沙，是宋代重要的理学宣扬地。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匾额**。

另一个就是1161年，由南宋名相、抗金名将张浚、张栻父子在妙高峰兴建城南书院，对宋代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后来，书院因张栻和朱熹的讲学论道而声名远扬。

北宋晚期，潭洲仿太学行“三舍法”，形成潭洲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的官学系统，号称“潭洲三学”。岳麓书院成为潭州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三次兴学，对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南的州、县学普及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

两宋时期，新儒学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风靡全国，因学术宗旨及地域学统相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南传后形成的以潭州为中心的地域性流派，传承自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

南宋初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和他的二儿子**胡宏**到湖南隐居，创办碧泉书院。**张栻**为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二十九岁时拜胡宏为师，主教岳麓书院七年，从学者达数千人，使湖湘学派成为南宋理学大宗，后代学者将其著作合辑为《南轩全集》。他与朱熹讲学论道达两月之久，后世学者称为“**朱张会讲**”，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影响湖湘文化数百年发展。

随着理学的发展，人们也开始用其思想礼义来规范言行，在清《善化县志》提到“忠孝廉节”四字所包含的孝悌忠信、守节自重、廉洁自律、济世救民等思想被世代传承，现在岳麓书院内就立有此四字碑，大字行书，题款为“晦庵朱子书”，也就是朱熹。

**第六部分：明清府城（明—清）**

**第一单元：藩屏府治**

**“明清府城”**这个展厅主要是展现明清两朝长沙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成就。时间范围大致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世纪末期的嘉庆年间。

**城墙**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明洪武年

间，长沙守御使邱广将年久失修、毁坏不堪的土夯旧城，改用砖石建筑，经过这次大修，长沙城“城用完固”。经清代咸丰三年大修之后，长沙“城池自是固若金汤矣。” 长沙城墙长一十四里，约8000余米。从这幅**明代长沙府行政区域示意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规模。

墙上的这段文献，**记载的就是当年邱广主持长沙城改建的情况。**

遗憾的是，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长沙城墙被拆除，仅余照片中**天**

**心阁城墙**这一段，长沙城墙至此成为绝唱。

而这些遗留下来的洪武年间的**长沙城墙砖与拓片**，其侧面刻有负责烧造城

砖的官员、职务和姓名。拓片则记载了当时善化县向府城提供城砖，完成修建工作的具体事宜。因此，我们能够推测当时明代长沙的城墙砖应该是由各县和州供应的。

明代长沙城除了完成砖石城墙的历史性改建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奢华的藩王府。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宋元不建藩屏、王室孤立的教训，参照汉晋南朝的制度，大封子弟，分藩就国，建立捍卫王室的宗藩。

先后有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及其子孙共4代12位藩王就藩长沙，共计195年，对捍卫王室和加强湖南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墙上呈现的是**明代初年藩王分封图**以及**明代历代长沙藩王年表。**下方这个**明代吉藩九龙纽寿山石印，**九条龙的规格与皇帝同级，体现了藩王较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明代藩王墓葬的出土物品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明代藩王陵园位于现在长沙南边的跳马镇，规模庞大，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寝之一。

而此处陈列的吉简王**墓志和墓志铭**，记录的就是在长沙就位时间最长的吉简王的生平，这对于我们研究藩王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旁边所展示的墓志和墓志铭，则属于明谷王朱橞的乳母张妙寿。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是这件**石质喇嘛塔**，喇嘛塔又称藏式塔或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建筑样式，这种塔在元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继续发展，和喇嘛教在当时的盛行有关。覆钵内部中空，里面有一件木质经箱，内置数十册用金粉书写的道经及佛经，这一特殊现象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比较罕见，是当时佛道合流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文物对于我们了解明朝早期历史，了解明初政治、社会生活及宗教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湖南地区明代墓葬研究树立了一个标尺。

诸王在封地有统兵之权，无治民之责，同时享有中央提供的各类财政支持，因此，当时的藩王家族在生活方面极尽奢华，最明显的就是修建了拥有八百余间房屋的吉王府。

旁边这个便是吉王府复原模型，其仿故宫而建，位于长沙正中，坐北朝南，东起尚德街与东牌楼街相交处，西到药王街与三泰街相交处，北至中山亭，南到司门口，规模宏大，挥金如土的王族生活历历在目。

当然，除了王府宫殿，藩王府也深刻地影响了长沙城市的建设，至今仍有

很多**长沙老地名像东牌楼、西牌楼、藩城堤、司门口、走马楼**等都留有王府的印

记。司门口是当时仪仗护卫司驻扎的地方，而走马楼的由来则是由于吉王府东边

有一处建筑群，高大宽阔，廊下可以扬鞭策马，因此得名“走马楼”。

“吉府上用”的瓷碗款识表明该瓷器为明藩王家族所使用，巨大的柱础、铺路石印

证了藩王府的宏大。展柜中陈列的龙纹琉璃瓦当和龙纹琉璃滴水也说明当时的藩王的建筑用度较高，以王公贵族自居。

**第二单元：湘省中枢**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最终于1644年被李自成所灭。长沙是南明王朝抗清的重要基地和主要战场，清顺治八年（1651年），湖南境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长沙成为清军与吴三桂叛军激烈争夺之地。展柜中陈列的这枚吴三桂所铸铁炮，就是当年三藩之乱的物证。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平定吴三桂叛乱，长沙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清代是长沙奠定湖南省会城市的重要时期。清康熙三年（1664年）设湖南右布政使司，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诏谕两湖分闱，正式设立湖南布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湖广行省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湖南正式成为独立行省。长沙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清代长沙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商埠，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盛况。

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两湖分治，湖南成为独立行省，管辖洞庭湖以西、以南和南岭以北的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长沙也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多媒体视频中展示就是**战国至清代长沙城市发展演变示意图**。

明朝到清初，由于湖南属湖广布政使司，每逢科考之年，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赴考，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洞庭湖波涛险恶，致使许多家境贫寒的湖南士子无法赶考。清康熙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人多次上疏，请求两湖分闱。闱，是科举时代对考场、试院的称谓，分闱就是指分设考场进行考试。

最终，朝廷于雍正元年（1723）正式诏谕**“两湖分闱”**，此后湖南科举与教育迅速发展，文化昌盛。

同时，清代的长沙在经济上也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农业方面，更是享有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其一，这与清政府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有关；其二，自明代以来，大量的江西移民，为湖南地区的粮食种植，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明代“江西填湖广”迁徙路线图**）；其三，长沙自古“得舟楫之便”，“当七省之冲”,发达的水陆交通,为长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文献和水陆交通图**），长沙也成为和九江（江西）、芜湖（安徽）、无锡（江苏）齐名的四大米市

此外，湖南自古为产茶之地，明清两朝茶叶贸易中，以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和“红茶”为代表的湖南茶叶，通过官方的“茶马互市”以及商家私人贩运而行销海内外，长沙也是天下闻名的“四大茶市”之一。

稻米和茶叶贸易带动了长沙城的商贸经济发展，清代长沙成为江南的重要商业城市，各类商业经营中产生的诸多老字号品牌，是长沙经济富庶的生动写照。这里的南正街和坡子街两条商业街道上的老行当和老字号复原场景，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繁华街市。